

## 序 言

（至于就美国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绝对有必要不动声色地满怀仇恨……我们必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糜振玉中将<sup>\*</sup>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仅仅十来年以前，即在 80 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因此，举例而言，像糜振玉将军这样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就会在 1996 年广泛发行的一部中国官员的文集中撰文谈及在一场长期争霸战中的仇恨问题：“本书作者全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权威，那本

<sup>\*</sup> 糜振玉将军已严正指出，他从未讲过此话。请参见书末所附的《笨拙的谎言——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文。——编者注

文集的编者说：“他们的观点反映了政府内和学术界内关于中国应当如何迎接下个世纪的大辩论。”（注1）

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现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曾三次在亚洲参与重大战争，每一次都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国家在那里取得支配权；而现在看来，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即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 21 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这一争夺将迫使其他国家表明立场，并将涉及所有重要的竞争方面：军事力量的强弱，经济上的繁荣程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大小以及有关被接受为国际准则的价值观和惯常做法的竞争。

我们的这些结论是以下述两个命题为基础的：一个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其办法不是入侵和占领邻国，而是使自己远比邻国强大，从而使东亚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至少得到中国的默许。

中国力量的增长及其以逼人的气势追逐本国利益的做法，不仅符合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而且符合一种中国领导人乐于加以利用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中国的雄心所依靠的动力是由于历史上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奇怪的、因而不大能为自满自足的西方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当独裁专制在世界上越来越成为过时货色的时候，中国统治者还在努力维持其独裁专制。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受到敌人包围的国家，利用仇外情绪来加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相

信，唤起人民的爱国心并使世界上存在一个要把以前帝国主义给中国的地位和尊严带来的侮辱长期延续下去的大敌，这是确保国民忠诚的一个可靠的办法。不然的话，人民就会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产生不满。反美成了一个涉及国家尊严的问题。

第二个命题是，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鉴于支配亚洲正是中国极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就势必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其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正迅速地使欧洲黯然失色的地区。像在 19 世纪那样，东亚的重大角逐涉及该地区的均势，即中国逐渐威胁到美国所保障和照管下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大致平衡。在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2 月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中国虽在言词上气势汹汹，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却很薄弱。借用毛式宣传以前形容中国那些年的敌人——苏联——时所用的说法，那时中国是一只纸老虎，即表面上很吓人，实际上却没有能力向境外投送力量。这种状况正在迅速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放弃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曾使它的形象如此可怕的那些做法。

严重官僚体制的、受到牢牢控制的中国即将收回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实体——香港。不论这次收回行动进行得顺利与否——我们的推测是，会有大量的政治弹压，但是，至少在起始阶段，不会造成什么经济混乱——它都将为中国提供世界上最繁忙的深水港和集装箱码头、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在美国贸易伙伴中居第 13 位、每年与美国的双向贸易额达 240 亿美元的强大经济实体。

1999 年，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将回归中国。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完成北京主权向历史上的中国大陆的全部地盘的延伸。但是，台湾依旧是收复领土方面的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而这肯定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紧张。1996 年 3 月，中国在台湾海峡举

行了军事演习，目的在于在台湾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威吓选民；美国则派遣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那一地区专门对准中国显示武力。这个事件很快被美国公众遗忘了。然而，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对峙，也是证明存在一个中美冲突的潜在燃点的明确无误的证据。在那个地区，中美两国不仅有着直接敌对的目标，而且双方有朝一日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为实现其目标而战。1996年在台湾海峡发生的对峙可能预兆着在未来随着一个越来越强大、自信和越来越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设法收复它所认为的它的国土的一部分而可能发生的对峙。

事实上，不论结果如何，台湾都将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除了援救台湾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它就有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其他亚洲友邦中丧失信誉的危险，而援救就意味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交战。在台湾人民同意与大陆统一这种极少可能的情况下，接管会和平进行。但这样就会使中国得到另一块经济上的大肥肉，即美国第9大贸易伙伴和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地方。不仅如此，台湾位于一些海运线的正中，而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本所使用的石油和原料全都经由那些海运线运输。换言之，中国若是完全统一了，那就会打破均势，大大加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战略力量。

1972年中美恢复关系后的最初几年是充溢着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情绪的时期；双方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相互之间的敌对已经让位于共同利益了。如今，这种情绪早已不复存在。近来，已经没有人谈论战略合作了，倒是有许多人在谈论中美关系变得充满不信任的种种情况以及觉得双方的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这些议论涉及诸如中国在靠近台湾的区域内试射导弹以及美国那两艘航空母舰在距中国海岸不远的海域巡逻等具体事件。北京曾怒气冲冲地警告华盛顿不要涉足台湾海峡，尽管那

是一条国际航道。中国的一位没有披露姓名的官员甚至居心叵测地提到瞄准洛杉矶的核导弹。这种敌对状态的诸要素中还包括中国不停地侵犯人权和向伊朗出售导弹技术及向巴基斯坦出售用来制造核武器的特殊磁铁。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座可以生产钚的秘密核反应堆；它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材料和核技术；向伊朗和伊拉克两国转让了大量的常规武器。中国向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出售或转让的军事装备中包括主战坦克、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器、战斗机以及地对地导弹——这还不包括中国在研制大规模毁灭武器方面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帮助。(注 2)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对美国的对抗措施及其他一些姿态感到恼怒。中国报界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民众，把美国的这些措施和姿态说成使人想起帝国主义侵略岁月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华盛顿作梗使中国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热切希望成了泡影；它谴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恭敬地接待了流亡的达赖喇嘛；它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它警告说要对向中国外国出售武器的行动施以报复；它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拖延战术。对台武器销售在继续进行，国会还表决在中国发动进攻时将支持台湾。美国报界大事宣扬人权组织关于中国实际上在用有意饿死的办法屠杀孤儿院中很大一部分儿童的报告。1996 年 5 月，《纽约时报》刊登在显著位置的一条消息报道，联邦官员正在搜捕中国的两家国营公司的官员，他们的“罪名是把 2000 支 AK—47 式冲锋枪走私到美国”(注 3)

在此之前两天，《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为在中国市场上牟取利润而作出的大规模努力——这一努力不仅在经济上给该公司造成了损失，而且在国会中招致指责，说该公司为了赚钱，向中国提供了机密的军事技术。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已达 400 亿美元，中国大有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势。(注 4)而且，中国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摆

脱两代人时间以来被强加的经济停滞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不同，它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美国的盟友。正如我们下文中将证明的，经过长期辩论之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把美国确定为它在全世界的主要敌人。在 60 和 70 年代，中国指责苏联在亚洲谋求霸权，而今，它把这一指责加到中国正式确定的敌人——美国头上了，与此同时，它同以前的苏联敌人的和解倒是有了很大的进展。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过一些看来变得缓和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6 年 6 月两国谈判代表商定比尔·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 1997 年内进行互访。但是，中国的和平攻势是一个策略步骤，它可能掩饰、但却不能消除两国间导致关系紧张的那些基本分歧。在美国这方面，国会、报界以及公众都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分歧。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地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众议院就中国最惠国地位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的发言就表述了这种情绪。他列举了中国的种种行为，从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 AK-47 式冲锋枪（他称之为“可能杀死美国青少年的枪支”），到据称中国由前苏联购买 SS-18 导弹，到迫害基督教徒，到在西藏实行弹压以及从那些在草草的、完全是作姿态的审判之后处决的犯人身上取下肾和角膜用于移植手术等等。“在所有三个令人关注的方面，”沃尔夫宣称，“即人权、武器扩散和贸易这三个方面，局势都恶化了。”这位议员关于中国购买 SS-18 导弹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尽管威廉·佩里国防部长已公开表示对中国试图向俄国人购买这些经过测试的洲际弹道导弹感到忧虑。毫无疑问，过去两年中，中国从俄国购买了价值约 44 亿美元的先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潜艇和防空系统。（注 5）从 1994 年到 1995 年，俄国的武器销售增长了 62%，

在向发展中国家售卖军火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则是它最大的买主，而且其购买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买主。(注 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现在购买的武器正是当年苏联为实现中国称之为霸权主义野心的那些图谋而部署的武器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发出的反美言论也委实有些过分，其论点无非是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家，对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有怨言，怂恿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其同台湾统一和发展经济的正当雄心为宗旨的“遏制中国”思潮。“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你们总是不喜欢，这显然是要遏制中国，”北京的一位外交专家 1996 年在一次采访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讲美国任何好话，在政治上就不恰当了。事实上，从政治上说，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居心险恶的超级大国、一个危险的敌人、一个横行霸道的超级大国是非常正确的。”

甚至在刚刚宣布江泽民将应邀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中国报界和中国领导人就用异常严厉的措施把美国斥为中国在全世界的主要敌手。就好像从中受到暗示一样，五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大多是以往参加过反政府民主运动的人——写了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此书愤怒地抨击美国，并很快成了全中国谈论的话题。书中对美国提出许许多多的指责，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分裂主义者”，从而“使中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被世人谴责为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该书作者之一张小波（即张藏藏——译者注）在北京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非常喜欢美国小说和电影，”他说：“但是，今天，我们觉得那个国家相当可憎。”

(注 7)

中美关系这种趋冷状态究竟是暂时的、是历史进程表上一条上升线中向下的短短一折呢，还是中美关系已经永久地滑向了冲突？许多专家——包括国务院的许多人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

通在内——争论说,中国和美国有多得多的理由实行合作而不是发生冲突,因此,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种观点认为,国会那种恪守道德的介入、白宫制定的前后不一的政策以及报界耸人听闻的宣传,都是对一种本应保持下去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干扰。美国的做法是在刺激中国,向它挑衅,惹它恼怒,而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事实上,这派意见还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羸弱,不论是对美国而言,还是对其邻国而言,都不致构成扩张的威胁。中国是一个防范心很重、感情容易受伤害、常讲气话的国家。但是,它需要美国,既需要作为贸易伙伴的美国,也需要作为保障东亚稳定的力量的美国。从长远来说,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全球伙伴,尽管两国关系会不时出现紧张时期,就像 1996 年 3 月在台湾海峡事件中那样。

我们的假定与此不同。我们相信,中国和美国确实具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交流领域。中国在贸易、技术和维持和平环境以利于经济发展等方面需要美国。不仅如此,尽管像《中国可以说》这样的书广受欢迎,钦佩美国、对美国友好的中国人仍然大有人在。

但是,尽管这种需要和友好的感情是很强烈的,它们却同我们在此将述及其他一些需要和利益相抵触。我们将证明,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之所以甘冒同美国交战的风险,不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如果收入差距增大,如果腐败现象继续败坏领导层的声誉,或是出现新的、类似 1989 年学生示威那样通过电视向世界转播的要求增加自由的运动,这个政权就会用爱国的旗帜把自己裹起来。而这样做的主要途径是把中国的各种问题归咎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



我们的论点是,过去十来年中,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它的目标是确保它那个地区内所有的国家——不论是要在东海行使石油勘探权的日本,还是要就美国海军舰只访问它的港口一事作决定的泰国——都不会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反过来,这也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一种将对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日益提出挑战的新的全球秩序。中国同前苏联密切的军事合作,它向中亚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提供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帮助,以及它在东亚的隐约可见的控制地位,使它在—一个非正式的国家网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个网络内的许多国家都有与美国相悖的目标和理念,它们中有许多国家理解中国对西方长期称霸全球的不满。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论证说,在这种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中,居主导地位的将是他所称的文明的冲突。我们则更多地从老式的政治联盟与均势的角度看问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与此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从 1941 年至 1945 年,美国同有史以来对人民镇压最残酷的独裁统治国家之一苏联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样一种伙伴关系对于击败纳粹德国的侵略是必要的。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联盟也完结了,代替它的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比较自然的竞争

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同中国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友好关系与它战时同苏联的关系是相似的。两者都是对立的双方迫于眼前的共同威胁而结成的联盟——一个是迫于纳粹德国造成的威

胁，一个是迫于苏联扩张主义造成的威胁。一旦威胁消除，与之相关的联盟也就成了从前的盟友之间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根本差异的牺牲品。应当指出，在联盟存在期间，许多专业人士、学者，特别是记者，同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国务院专家，都用当年美国同苏联结成战时联盟时所使用的某种虚幻的多棱镜来观察中国。

在 40 年代初，历史上最凶残的大屠杀刽子手约瑟夫·斯大林被说成是一位固执而古板的父亲般的人物。中国那位受到类似的宽厚评价的邓小平倒是有几个有利的条件。他曾两次遭到毛泽东极其激进的追随者们的清洗，因此，当他重新掌权时，他似乎就体现了从激进的、反美的中国向温和的、亲西方的中国的转变。第二，他个子那么小，仅有 5 英尺高，因此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和斯大林不同，他在许多方面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值得钦佩的人物。他不曾试图把中国的控制扩大到它的疆域以外。他倡导的政策比以往有过的政策要开明得多。在邓小平经历了第二次政治屈辱复出之后的将近 20 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登载的所有那些封面文章曾提醒我们说，中国正在走着资本主义道路。世界上生意最红火、赢利最多的肯德基炸鸡店，就设在距存放毛主席遗体的那座纪念堂一箭之遥的地方。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建立了股票市场。《芝麻街》中的大鸟访问了中国。10 万名大陆学生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境内，在几年前还是生产队和集体农场的那些经济特区内，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的香皂比在美国卖的还多。摩托罗拉出售手提电话可谓生意兴隆。波音飞机公司全部产量的 10% 销售在中国。中国的私人生活天地及文化与知识自由的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大。

从对中国的这种看法中产生的令人宽慰的见解是：以前曾是那样令人不安地不同于今天的这个国家，正在变得与我们越来越相似，而只要它与我们相似，我们相信，我们的利益与它的利益就

将是共同的，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冲突。

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许多特征，尤其是忽视了它事实上是一个与美国极少共同点的国家这一点。例如，毛泽东至今还躺在那家美国快餐店附近的纪念堂内，仍被官方尊为现代中国之父。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政治犯最多的国家——它正式承认的数字为3000人。它是这样一个国家，为了驱散学生示威，它调来坦克和装甲步兵，并开枪打死好几百名——有可能是两千名——自己的人民，而事后——尽管全世界都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那次军事行动——却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否认杀过人。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暴动期间，我们两人中有一位正在北京，亲眼看到中国士兵在街角摆放花圈，祭奠在镇压那次突然被说成‘反革命暴乱’的行动中丧生的士兵。政府控制的媒体对死去的学生却只字未提。当美国电视上播出一名中国人边模仿中国军队用自动步枪开火的动作边述说当天他所目睹的情景的镜头后，他很快在一次全国性的搜捕中被抓获，并以从事反革命宣传罪被判处10年徒刑。<sup>\*</sup>

此人被判刑这件事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局势中还有几个残存的因素：第一，这个政权在感觉受到威胁时，仍然乞灵于政治谎言；第二，当它感到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有丧失的危险时，它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第三，那里没有真正的、应有的法律程序；第四，不论负责处理中国同外国关系的中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可能多么温文尔雅、成熟老练、通情达理，掌握决策权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却有一条强硬路线。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条路线把美国、它的价值观和它的生活方式视为对中国的威胁。

当然，中国仍旧以武力占领着西藏，对西藏的宗教活动和文化活动实行严格的限制。1995年，中国当局给世界各国演出了一幕

<sup>\*</sup> 这一段文字，以及下面关于西藏的一段文字，又是本书作者借用谎言进行反华攻击诬蔑的例子。下文中还有许多这类谎言，望读者明鉴。——编者注

绝妙的好戏。执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和组成某种官方“科学”无神论最高委员会的那些官僚们否决了以西藏宗教当局挑选的 6 岁男孩作为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最受崇敬的人物——的转世灵童。中国把一些僧侣召到北京,强迫他们挑选另一名男孩。西藏人最初挑选的那个牧民的儿子被关在北京的一个秘密地点。他的父母被报界指责为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的人。后来他们便失踪了,估计是被抓起来了。

中国侵犯人权并不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这种事件突出地表明了总的关系状况的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今天存在的这种侵犯人权事件的程度是衡量我们过去在中国问题上自欺欺人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尺度。那时我们以为中国在迅速地变为某种自由的国度,与我们越来越相似。第二,人权问题突出地表明,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政治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第三,中国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恳请、威胁和要求故意表示轻蔑,这既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也反映出它自信它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处事方式。

长期以来,美国决策人一直寄希望于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这些乐观派最终可能证明是正确的。推动各国朝全球民主的方向前进的势力是强大的,中国大概不会永远不受它们的影响。但是,出于好几个原因,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首先,这有悖于中国的政治信仰。中国在其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未形成过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或司法和传媒独立的概念。它有史以来从未根据征求被统治者同意或尊重大多数人意志的原则行事。中国始终受着一个自我挑选、自我延续的集团的统治。这个集团行事诡秘,把反对它的行为视为叛国。

第二个原因是与第一个相联系的。这就是要想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在中国当权的官僚们就得放弃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有过这样做的打算。中国的传统是,个人

的好处来自政治权力——不论这种好处是涉及由国家负责维护的禁宫，还是国家提供的仆人或是一位日本商人为换取进口许可证而馈赠的一辆奔驰汽车——而这个官僚体系是不会为了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原则便自愿放弃这些好处的。

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把民主改革与社会动乱等同起来的看法大概是发自内心的。中国在为它的千百万人民创造比较富裕的生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里的贫富差距在增大，那里的骚乱和失业现象严重，那里许多人的头脑里整天转动着不断增高的期望。看来，那个国家的人民既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高兴，又不满于腐败、犯罪、地方官员小小不言的滥用权力行为以及由于以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提供的许多保障被取消而致使现在的生活朝不保夕。面对社会暴乱前景的中国领导人肯定要强调爱国团结和绝对领导。

最后，要使中国政府按照尊重民众意志的概念行事，那就意味着要失去它对一些地区的控制，而它觉得它的国家利益是不允许它失去对那些地区的控制的。例如，如果按照民主原则，而不是按照北京的绝对命令来治理西藏，西藏人民将创立一个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挑战的独立运动。中国若实行民主，那将迫使中国领导人承认台湾人民拥有自己决定是维持该岛事实上的独立，还是进一步走向法律上的独立抑或成为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国的一部分的权利。但是，给予台湾人任何这样的权力都将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两个后果：它将损害中国坚持要实行统一的不可谈判的立场，并将给大陆提供一个有害的先例。他们会问：既然在台湾人的政治归属问题上征询他们的意见，那为什么不征询其他中国人对自己归属的意见？中国统治集团是绝对不愿意遭受一个走向真正民主的步骤将给它的声望带来的损失、给它的权力造成的破坏的。

例如，正当中国人准备收回香港的时候，中国宣布撤消香港经过民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有人说，这个决定本身是民主的，因

为它是由北京任命的香港居民组成的筹委会作出的。是这个委员会，而不是北京的官僚们投票撤消了这个议会。而且，筹委会中还有一名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冯检基——投票反对撤消这个立法机构。然而，冯检基在他投了唯一的反对票的第二天便接到通知，说他已被从筹委会中除名，今后不得再参加筹委会的表决。鉴于和谐地处理香港回归对中国的重要性，人们还以为中国实际上会欢迎他这唯一的反对票呢。那本来会造成一种表面印象，使人觉得这次表决的结果包含了投票人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

但是，不然。在关系到自己对权力的控制的问题上，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一致意见情有独钟。实际上，在接管香港之前的几个月中，中国在许多细小的方面竭力确保无人对它的控制权提出异议。当一位名叫黎智英的服装零售商兼报纸发行人在他在香港办的杂志《Next》上刊登了开罪于中国的文章时，北京政府很快查封了他在中国境内开设的服装连锁店，既惩罚他又做效尤。但在1995年黎智英创办了《苹果日报》后（这家报纸的记者立即被禁止报道官方举办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活动），这份新报纸很快成了这个殖民地第二大畅销报。这是一个迹象，说明香港人民对自由的习惯程度是北京政权所始料不及的。后来，北京当局同英国人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有一件是同1997年6月30日——即回归当日——的保安有关的。英国人表示相信香港警方有此能力，中国人则要求从他们自己的公安部派一支部队去。其原因倒不在于中国人担心会有人对前去参加庆典的高级领导人行刺，而是担心民主派会举行反对中国统治的示威。

这从某种普遍意义上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过去二百年的历史可作判断依据的话，各国的民主程度越高，它们彼此交战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独裁的国家，就越是容易开战。确实，如果北京现政权继续进行军事冒险——就像它1996年在台湾海峡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同美国发生起码是有限的海空冲突的现实可能。不

过,我们仍然相信发生实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对此我们可以感到欣慰。中国并不谋求使用武力去占领邻国的领土或者进攻美国。这里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情况,没有卫星国或仆从政府,没有坦克驻在邻国的领土上。不仅如此,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某种仍被称作共产党的东西所握有的权力——在中国已经消亡,这个国家也丝毫没有当年曾使苏联更具威胁性的那种救世主式的冲动。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不过,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毕竟大于它们实行合作的可能性。中国现在并没有取代苏联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它在逐步成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其更难对付之处,因为中国人与苏联人截然不同,他们不是一个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之上的军事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建立可靠军事力量的经济强国。关键在于中国力量的稳步增长,不仅是在中国境内的增长,而且是在整个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中国设想自己将在全球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正在同西方的其他对手建立的关系是与美国为敌的。此外,还有一个由复杂而棘手的台湾问题构成的非常具体的潜在燃点。这是因为台湾局势包含两个不可调和的因素 其一,台湾人民不愿被北京现政权统治;其二,北京把统一视为如此重要的事情,以至它决不会放弃这个目标。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随着北京政权逐渐失去耐心,它出兵攻打台湾——以及美国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加。

如果中国在不能通过谈判实现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的情况下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一种可能是通过海上封锁,一种可能是发动全面军事进攻——那将出现什么局面呢 多年来,美国一直提醒中国注意它是坚决主张和平统一的,到那时它能袖手旁观,默认中国使用武力吗 如果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卷入同中国的冲突,那卷入的规模和结果又将如何呢 如果美国不去援救台湾,听任这个岛屿被占领,这对美国在亚太其他地方保持可靠的力量将意味着

什么？由美国来保障军事安全、为从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各国带来了一个非凡的和平与经济增长时期的均势，将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未来将会面临的问题。但是，近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刺激性、越来越咄咄逼人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几乎肯定会加剧紧张状态：■1995年初，它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有争议的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它向巴基斯坦出售了核武器技术，向美国的敌人伊朗出售了导弹。■它向几乎所有同美国有争执的国家——伊朗、苏丹、尼日利亚——提供道义上的、有时还有物质上的支持。■它向邻国发出外交警告，要它们把中国的利益置于比美国等“外界”大国的利益优先的地位。■它是一个暗示有核武器瞄准美国的核大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被这种武器瞄准的国家。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过去 10 年中，中国的自我概念及它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 1992 年以来，共产党领导层内传阅的党内文件把美国说成中国的实际敌人。1995 年，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年会上，中国外长钱其琛语惊四座，宣称现在是美国停止把自己视为“东方的救世主”的时候了。钱其琛说：“我们不承认美国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 8）这一声明暗示着中国的战略考虑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的设想是，美国撤离后，中国将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国家，而这正是它所希冀的。

眼下，南中国海由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四国瓜分。当中国的海军、空军和两栖作战部队力量增强后，它将有能力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明确宣布的目标是要占领遥远南方的岛屿和礁滩，直至中国军队几乎可以看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这将不仅改变亚洲的均势，而且将使中国扼制唯一可使用的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海运线。美国军舰和货轮每天都穿越南中国海，运送日本所使用的几乎全部石油的油轮也是如此。



同中国的激烈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中国和美国在亚洲唯一明确的共同目的是防止朝鲜发生第二次全面战争。两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尽管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两国经济关系也充满冲突。简言之，给美国同欧洲或者美国同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泰国、菲律宾、台湾等——之间带来共同性的那种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少之又少。不仅如此，中国在政治上是不可预测的，陷入分裂和派系斗争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这两者将加重它的不安全感、偏执心理和傲慢态度，使它更倾向于把恐吓、威胁和仇外情绪当做对外政策的工具来使用。

1995年和1996年，中国的表现就像一个不受外交惯例约束，甚至不受它自己作出的公开承诺约束的胡作非为的国家。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并且拥有与这种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发出了许多信号，表明它把西方视为它在精神和实际上的敌人；而在这一格局中，美国与西方完全是等同的。